

名师讲义

蒙久通

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



名师讲义

蒙文通

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





蒙

文

集

《名师讲义》丛书

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这些位名师，都是 20 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



名师讲义

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李济林

前言

本集收录了先君子文通公的讲义二种：一、《周秦民族史》，二、《巴蜀史的问题》。《周秦民族史》是一部老讲义，讲用在十年以上，曾经多次修改。本次重印是以川大讲义作为底本，而保留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讲义的第一章，增加了为龙门书局出版《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时所写的《序》和另三篇附录。《巴蜀史的问题》是1959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补充。1961年在川大历史系讲授“巴蜀史”专题课时，曾作为讲义印发。后将两种修改本整合为一，收入先君《巴蜀古史论述》（巴蜀书社1981年出版），今据此重印。兹为便于读者，窃不自嫌浅陋撮取其鄙意以为纲要大旨者，略缀赘语，置于简端，至于能否有裨高明，则非所敢知也。

（一）《周秦民族史》

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有其长期、复杂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过程的。传说“禹会诸侯于 1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商汤时有三千余国。及至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春秋大事表》考出一百四十余国）。至战国时，存者只有十多国，最后并为七国。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兼并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历近二千年的历史了。秦朝的统一虽然还不是我国现有版图的大统一，而只是一个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它奠定了我国进入一个崭新的长期统一的（其间也有间断的短暂分裂）、不断发展的、日益巩固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到现在已是二千二百多年了。我们这个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无可伦比的，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引以为荣的。

我们这个举世无双的长期保持正常统一状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它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条件的。第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大小市场，加强和密切了国内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互补，从而奠定了建立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当然，这个“经济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远不是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那种全国性统一市场，但我国国内大小市场在战国时已开始形成则是无可置疑的。第二，从夏代开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日益成熟的华夏族（或称诸华、诸夏，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开拓性的民族，开放就能包容而不排他，开拓就能进取而日益进步。因而它是一个有先进文化、先进经济、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所以说它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说它有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



样,它就自然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核
心。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就只是时
间问题了。而我国历史的这两个条件的成熟,正是在本讲义所
论述的时段中。第一个条件是多年来学者们讨论已多的问题,
此不赘述。第二个条件虽不是本讲义作者明确提出的论题,但
作者在讲义的论述都可认为是和这个论题紧密联系的。

一、先君曾说:民族史应以民族活动为中心,民族常常是移
动迁徙的,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地区。他对周秦民族的考察正是
从这个视角出发,这就成为本讲义的重心,而本讲义在河北女
子师范学院讲授时就是名为《周秦民族移住史》。首先,他指出
西周末百五十年之间,北方大旱饥馑,而淮汉流域则雨泽丰沛,
于是周王室就开拓南方而移民淮汉,在早已开拓的伊洛河济地
区反因人民流离而荒芜不堪,这就给非华夏民族腾出了移住活
动的空间。原住陕北、甘肃东部一带的獫狁之戎、姜氏之戎和犬
戎在多次打败西周王室之后,在元前 771 年杀死周幽王于骊
山,其子平王被迫东迁洛阳,关中周地遂先后为戎人各部所据。
作为戎裔的秦国,在东周初逐渐强盛之后,自甘肃天水地区向
东发展,不断从戎人手中夺得原来的周地和周遗民,关中戎人
被迫东出骹函进入河南西部,为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分布
至广,且在元前 649 年联军同伐京师,入王城,秦晋两国出兵讨
戎援周。此后戎人与周王室周旋了一个时期,因受到新兴于河
南新郑的郑国的阻挡,没能东渡黄河,遂折而南走,越过外方山
进入颍、汝上游地区,且至谢西。汝南为戎蛮子,汝北为陆浑之
戎,夹处晋楚之间,后为两国所灭,余部为阴戎、九州之戎。戎人
另部也有在春秋前期自豫鄂西入楚南者。作为戎裔的申、吕、

许、缙诸姜姓小国，本在周都西北，宗周灭后都先后南徙汝汉江淮。西北戎人远徙华夏地区的遗迹在考古学和民族学上都还可以得到印证。

狄人古称鬼方，居陕甘北部，其中赤狄春秋初已至晋西、晋北，晋文公为公子时曾避难于狄，时狄尚在晋西；居狄十二年而转至卫、齐、曹、宋、郑、楚，则狄已自晋西，北沿太行南下而至晋东，显因受到秦晋夹攻之故。在公元前 651 年以前，狄人逐灭黎侯（山西黎县），接着又灭邢（河北邢台）、灭卫（河南淇县），其势甚猛，但以受到齐国在东面的拦截，不得渡黄河，西面又受晋国的阻击，于是西南而侵成周王畿，首先攻占温邑（河南温县南），后来又挑起周襄王的兄弟不和，公元前 636 年与叔带合兵攻周，襄王被赶到郑国。得到晋文公出兵勤王打败狄人，才得返回王城。晋人攻温，捕杀了叔带。晋国因此取得被狄人所占领的卫国和周王的东阳和南阳之地（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朝歌以南至轘为南阳）。狄既不得志于周、郑，齐霸已衰，遂向东侵扰齐、鲁、宋、卫，且决河于宿胥，东走更远达渤海地区，迄至晋灭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廛咎如而后止，前后逾六十年，于是狄地尽入于晋，晋地自山西而河北、河南，以至山东腹地，此见晋国东向扩地之广，亦以见狄入华夏据地之广。《左传》载元前 628 年“狄有乱”，次年而史见白狄之名，当是白狄自此而后与赤狄分离。白狄之初也居晋西，夹处秦晋之间，或时从晋，或时从秦。及赤狄既亡，乃沿赤狄之故道东来，居赤狄太行旧壤，也可能是晋国魏绛和戎所招来。其部落以肥、鼓、鲜虞最著，而鲜虞最大。鼓在今河北晋县，肥在藁城，鲜虞则清代河北的“新乐、行唐、灵寿、平山、井陉、获鹿、无极、曲阳及定、易、唐、完诸县，并在其提

封之内”。公元前 507 年，鲜虞曾败晋师于平中，且俘虏晋将观虎。公元前 496 年，晋大夫中行氏作乱，率狄师袭晋，虽然未克，但可见鲜虞之强。春秋晚期改称中山。战国时处赵、燕、齐三大国之间，都顾（河北定县），地方五百里。魏国曾一度灭掉中山，但不久又复国，徙都灵寿。公元前 318 年，中山与燕、韩、赵、魏同时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公元前 295 年为赵所灭。

楚为南方大国，都丹阳，初在汉水中游，后迁枝江，又再迁于郢（湖北江陵）。楚国领土辽阔、族类众多。濮人周初也在汉水中游，“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及至春秋已处江汉间，在楚的压力下又由楚西部南下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卢戎本在梁州，经金州（陕西安康）、竹山（鄂西北）入居南漳，曾与罗子（居宜城）大败楚师，后随罗南迁枝江，又更南入湘而居平江。楚武王克州、蓼、随、唐，而“大启群蛮”。“庸人（居竹山）率群蛮以叛楚”，是春秋前期蛮人皆居楚之西北；至战国时“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则是蛮人已南徙湘中了。虽然记载简略而楚境非华夏民族的移徙已可见其大概了。而楚的郢都因战国晚期被秦攻占，也不得已而东迁于陈（河南淮阳），又徙寿春（安徽寿县），可以说也是远徙了。

华夏北方的追貉（通貉），宣王时尚居王畿之北，后为狄人东徙所逼，乃经晋北东徙燕北。春秋初，齐桓公伐山戎，就是因山戎侵扰燕国，这个山戎就是追貉。桓公伐山戎并及令支、孤竹，令支也就是离枝、骊戎、骊土之狄，都在晋之东北及燕北，也当同是貉族，住地相近，所以与山戎一起活动而受到讨伐。春秋中期，无终嘉父使使如晋请和诸戎，无终居今河北蓟县玉田一带。就是燕北的山戎。公元前 541 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

太原，无终显然是此次战役的群狄之首。由于群狄与无终合，故狄入鲁宋间而山戎见于泰山侧，《鲁颂》有“淮夷蛮貊”之语，此貊正是这个山戎。晋北之无终至战国而为赵武灵王时之无穷，稍后又有走赵南居秦赵之边者，故赵又南伐山戎。陈寿、范晔述秦汉东夷之国，居挹娄（肃慎）、朝鲜之间有夫馀、高句骊、沃沮（后又分南北）、涉四国，涉就是追，又名涉貉；这四国当是骊戎、狄祖及追之东徙者，都应是貉族。涉貉之南为三韩，三韩地为古之辰国，可能是殷末箕子所建。韩原在王畿之北，后徙涿郡方城，又后徙海中，据有辰地，故又称辰韩。北方民族之徙，当是韩先走，涉次之，祖又次之，骊次之，山戎无终又次之。无终后还居代北，战国时又有东胡、林胡、楼烦来居之，也当都是貉人。东胡在燕北，而西接赵境，林胡、楼烦先在燕赵北，后及赵西。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为乌丸、鲜卑），林胡为赵将李牧所降，楼烦亦为匈奴所并，余众有居河套之南者至汉犹存，卫青后乃亡。

秦西诸戎，在秦国东向发展之际，又从后面侵夺秦的领土，及秦穆公“用由余之谋，讨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乃有陇西、北地之地。及至战国，义渠、大荔之戎兴起，各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而秦的陇西、北地又失，及秦孝公用商鞅而秦又强，至昭王灭义渠（公元前 272 年），于是乃重建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东夷之国，奄与淮夷、徐戎最大，武王、周公、成王三世伐奄而后奄亡，淮夷、徐戎亦经伯禽、周公、成王三世征讨而后南迁。穆王时徐又复盛，“率九夷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虽讨之而徐犹存。厉王时徐又入寇，宣王讨而平之。春秋时淮夷又兴，北扰杞、郕等国，鲁又出兵讨伐，徐与淮夷乃附从诸夏。及楚日益强



大,吴又突兴,徐为吴灭而淮夷附从于楚。东夷民族,当其强大时则举族北上,及其衰弱则又复归南方。

不难看出,周秦时期六七百年间非华夏民族的迁徙是频繁的,情况是多样的,其与华夏诸国的关系是复杂的,矛盾和争战也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特别是来自西北的戎狄之族,大量深入到中原以至汝、汉、江、淮各地,延续的时期也很长久,到最后都被华夏国家所兼并(当然也有少量被非华夏国家所兼并的,如潞子、鲜虞)。这就导致了各民族的混居杂处,成为同一国家的编户齐民,就必然增强民族之间的交往、影响和互助,而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由于史料的缺略且极零散,上述民族迁徙的概况主要是根据诸族出现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顺序而梳理出来的,但地理有古今之异,而纪年又各国不同,且有的记载又模糊不清,因此很多地方都需要进行考证。先君对此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顾颉刚先生的《当代中国史学》书中在评述先君“对古代沿革地理的贡献亦很大”时,特别提到的几篇论文,都已编入本讲义。故在阅读本讲义时,望能对这些问题给予重视,以求准确掌握。先君本来是准备编绘一份“年表”和若干“地图”以帮助读者的,但因年老力衰事杂而未能着手,幸好现在有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解决不少问题,但先君在一些问题上的见解并不完全与谭图相合,这就只好请读者卓裁了。

二、揭示了一些非华夏民族国家的强大及其与华夏国家的关系。犬戎与申侯、缙侯共杀周幽王于骊山而西周灭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戎人之强早在周初就已显露出来,文王受命之四年(约为元前 1052 年),“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

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此昆夷即犬戎。穆王西征犬戎，俘其五王，而迁戎于太原。夷王又征太原之戎，虽获马千匹，但戎人仍然强盛。宣王立，使秦仲伐西戎，反为戎人所杀（元前 824 年）。后又遣兵伐太原戎，竟不能克（元前 797 年）。五年后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又二年，王师又败绩于姜氏之戎。且这两战是由王师和晋国合力进行的。宣王前期能平淮夷、征徐戎、伐荆蛮，号为中兴之主，然至晚年竟对戎人无可奈何！接着，元前 779 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战死。同年，戎人围犬丘，俘虏了秦襄公之兄世父。则幽王之被杀、平王之东迁，已是势所必然的了。春秋之世，戎人既入中原，元前 649 年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秦晋联军伐戎救周，戎始离去。秋，晋侯推动戎人与周议和，可能并未成功；第二年，齐桓使管仲促成戎与周议和，又使促成戎与晋议和，可能都未成功；所以在次年，戎人又寇京师，于是才有齐桓公征发诸侯之师前来戍周。显然，这时的戎人还是相当强大的。数年后，陆浑之戎又来居伊川，虽说是“秦晋迁之”，实则是秦“贪于土地，逐我诸戎”。而晋则利戎人之来，西可捍秦，南可捍楚，于是招来使居伊雒之间。秦晋殽之战（元前 627 年），就是“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且“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之志也”。晋国拉拢戎人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好处的。不仅可以捍御秦楚，且又利用戎人侵鲁、侵宋，甚至侵王畿，故招致了王室大臣詹桓伯对晋国发出了“逼我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国，谁之咎也”的怨言。陆浑处于两大之间，附楚则晋怨，附晋则楚怨，很难两面讨好，元前 525 年，晋国因陆浑“甚睦于楚”，于是借祭祀雒水为名，乘陆

浑不备，出兵将陆浑灭掉，周也乘机捞了一把，“周大获”，可能是俘获了许多戎人。陆浑首领投奔楚国。陆浑是戎人中最强大的一部。此后就剩下力量不大的九州之戎、阴戎了。戎人另部戎蛮子（又作鄆子、贺戎、茅戎）也夹在晋楚之间，居河南临汝，与楚更近，公元前491年，在晋楚联手下也被灭了，遗民尽为楚国所俘以归。大概在晋楚灭蛮氏的同时，秦西戎部义渠、大荔强盛起来，各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穆公所开拓陇西、北地一带皆为戎所侵占。公元前430年，义渠伐秦，侵至渭南，是已深入秦地。公元前335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公元前318年，义渠起兵袭秦，大败秦师于李帛之下。表明义渠还是较强大的。后此三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可说是很大一片土地了，但义渠仍然存在。直到公元前305年，秦用阴谋“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然后又才重建了陇西、北地、上郡，除掉了东并六国的后顾之忧。

狄人在春秋早期自秦晋北部东南折沿太行南下，公元前662年伐邢，齐人救之；两年后又伐卫，齐又率诸侯救之，虽当时正值齐桓公霸业极盛之时，但却不能挽救邢卫灭亡的命运，而只能把邢卫丧败的余众迁往黄河以南以避之，狄势之盛不难概见。与此同时，处于晋东之狄皋落氏也想乘灭邢卫之威以侵晋，晋以太子申生为将，申生抱必死之心以与狄战，败之于稷桑。此显当为一大战，惜文献缺载，其详不可知。狄人势力既东阻于齐，西阻于晋，于是斜向西南近逼王畿。公元前650年，狄人攻占王臣苏忿生的采邑温。数年之间，狄又侵卫、侵郑、侵晋，攻占了晋的狐、厨、受铎等地。公元前636年，又乘周王兄弟不和，助太叔攻襄王，王出奔郑，太叔居温。次年，晋文公出师勤王，右师围

温，取太叔杀之，左师迎王，入于王城，显然是给了狄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文献却又缺乏这次战役的记载。这之后，狄人长期是晋的大敌。公元前 627 年，狄伐晋，大战于箕，主帅先轸战死。四十二年之后，晋中军元帅栾武子还拿这次战役与晋惠公被俘的秦晋韩之战、三军溃不成军荀息被俘的晋楚邲之战，并列为晋的三大国耻之一，可见箕之战是晋国的一次大败仗。所以晋大臣士燮也把狄人和齐、秦、楚并列为晋的四大强敌。但由于文献缺略没有记录下来，《春秋》反说是“晋人败狄于箕”。《左传》还说是先轸“免胄入狄师”。先君认为这些都是晋史的讳辞和饰辞，是不足信据的。赤狄各部中以潞氏为大，是众狄部的盟主，潞子婴儿还娶了晋景公姐姐为夫人，而其相丰舒主政时竟将伯姬杀掉，可见出潞氏部的强盛，它并不惧怕晋这个大国。后来晋国施行离间计策，表示愿与“众狄”结好，晋君并亲去狄地与“众狄”会晤，“众狄疾赤狄（潞氏）之役，遂服于晋”。这就瓦解了狄人联盟，潞氏陷于孤立，于是在公元前 594 年被晋国灭掉。晋灭潞氏后，强占了狄人的土地，并把狄民当作臣仆之类来赏赐给大臣。潞氏灭后，白狄又来处太行赤狄故土，而鲜虞部最强，大致有方五百里的领土，俨然是个不小的国家，可能不止千乘的兵力，故能在公元前 507 年败晋师于平中，并俘虏了晋将观虎。晋虽进行两次报复性反击，但似乎没取得什么效果，鲜虞反而多次干涉晋国内政。鲜虞在春秋末期改称中山。公元前 493 年，齐、晋干预卫国君位之争，齐、卫求援于中山以抗晋，也可看出中山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入战国，中山虽曾一度为魏所灭，但不久又复国，且战败魏国，继又战败赵国和燕国，并在公元前 318 年与韩、赵、魏、燕“五国相王”。但终因比较弱小，元前



295年为赵武灵王所灭。但赵灭中山亦非易易,而是在燕、齐两国帮助下花了五年功夫才拿下的。鲜虞中山以一千乘非华夏族国家夹处赵、燕、齐三万乘之间,建国达二百余年,也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春秋前夕活跃于山西中部的北戎,虽事迹不多,但亦非蕞尔之邦,曾与晋国和邢国交战。入春秋初,曾南侵郑,郑人大败戎师。不久(元前706年)又南侵齐,齐请郑救援,又才大败戎师。以齐之强犹求援于郑而后克,既克而后犹需诸侯之大夫戍齐,是北戎之强也不可小视。若非郑庄小霸,则北戎或早已驰骋于华夏之域了。北戎后居代,称代戎。代、大同义,是晋文公之母大戎可能即此战国初之代戎。代在今河北蔚县。代国包有河北北部之宣化、易县及山西大同、繁峙等地,土地亦广。《寰宇记》说:“代本北狄,姜姓国,周末强大称王。”当是有根据的。战国初,代为赵襄子所灭,有国亦达二百多年。

这里要特别指出,元前642年,齐桓公死,宋襄公因图霸而伐齐,此后的《春秋经》记载了:“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五月,狄救齐。”“冬,邢人、狄人伐卫。”次年秋,“卫人伐邢。”又次年秋,“齐人、狄人盟于邢。”解说《春秋》的书以“三传”为最古:《左传》只简单说了句:“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穀梁传》则说:“伐齐,非伐丧也。”“狄救齐,善救齐也。”“狄人、邢人伐卫。狄其称人何也,善累而进之。伐卫所以救齐也,功近而德远矣。”显然这是对狄人活动的肯定。《公羊传》没说什么。只那位被称为“世儒无及”的公羊学大师何休在《公羊解诂》中说:“狄称人者,善能救齐,……犹有忧中国之心,故进之。”“狄称人者,能常与中国也。”这说明汉代的公羊家

对狄人这些活动也是肯定的。先君在讲义中还说：“方狄之西侵周，奄有河内，齐霸已衰，宋襄不竞，宋伐齐丧而狄救齐，卫方病邢而狄为邢谋卫，威势既振，大义亦伸。”这样地肯定戎狄，在本讲义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是接受了汉代今文家的意见。类此求之，则戎子驹支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也是颇为值得讨论的。驹支不仅解释了宣子的责难，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夷华民族间“不侵不叛”的和平相处原则。这个原则是大大有益于各民族各自发展，相互交流、帮助而共同进步的，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戎、晋长期和平共处，使部分陆浑戎人（特别是其上层）摆脱了“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的质朴状态，而学到了华夏文化，在驹支与范宣子对话结束时，驹支还遵行华夏外交场合常用的赋《诗》表意的惯例，“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经·小雅》的一篇，其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两句，大概就是驹支所要表达的意愿，范宣子遂也不得不表示道歉，还让他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这可说是一个“用夏变夷”、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典型范例。至于本来就有较高文化的东夷，除了个别国家还有“用人于社”的陋习外，在邻国还保存了某些在华夏丢失已久的制度文化，引起了重视古代传统文化的孔丘前往学习，并感叹这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例证。这显然也是值得表而出之的。

孔子所宣扬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仁”，虽已见于《国语》、《左传》等书，但最早可能是出自东夷民族的。庄子说“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孟子说虞舜是东夷之人，这大概是最早讲仁义的人。不少文献都说徐偃王“行仁义”，且以仁义而亡，徐戎实东夷的一国。“夷俗仁”之言虽始见于许慎，而“东夷天性柔顺”之说